

>>>>

四川大学中文系 主办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第1辑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四川大学中文系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XIANDAI
ZHONGGUO
WENHUA YU
WENXUE

第1辑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 毛迅, 李怡主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5.4

ISBN 7-80659-713-1

I. 现... II. ①毛...②李... III. ①文化-中国-现代-文集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12-53②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221 号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毛迅 李怡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028)85910167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60千
书 号	ISBN 7-80659-713-1 / I·234
定 价	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 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柏桦 蔡震 陈国恩 程光炜 陈方竞 丁帆
范智红 高远东 高旭东 郜元宝 何锡章 金龙云(韩)
孔范今 孔庆东 李今 李继凯 刘福春 刘勇
栾梅健 罗振亚 逢增玉 朴宰雨(韩) 谭桂林
王兆胜 王中忱 魏建 解志熙 岩佐昌晔(日)
袁国兴 杨剑龙 张中良 赵学勇 郑家建 朱栋霖
朱晓进 朱寿桐 邹红 张健 张福贵 周晓明

目 录

卷首语

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方式 毛迅 李怡 1

现代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流变 王富仁 7

中国文化的当下语境：

在传统、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 张光芒 王明科 26

现代文学发生问题

中国文学“现代”之起点

——兼谈“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历史意义 杨联芬 40

历史关节点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李润霞 45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多重视野 王晓初 49

学府与报刊出版：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中“症结”透视 陈方竞 54

唯美主义与20世纪中国小说观念的发生 黄洁 76

无法安放的文学想象：现代中国文学自治论的发生及困境 马睿 82

白话文学理论的发生与实践

——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 曹而云 93

现代作家新论

两个“无名的人”对20世纪世界图景的预言式解读

——在“隔离”中读张天佑《鲁迅、卡夫卡解读》 钱理群 100

《现代作家新编选本导言》六则 吴福辉 103

智者的悲歌

——穆旦后期诗歌研究 （韩国）金素贤 115

对视与争鸣

“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 曹顺庆 周春 127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阐释反思 李自芬 130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是什么？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立场来看 段从学 137

巴蜀文学重读

一位现代派诗人对巴蜀文化的皈依

——何其芳与“花间词” 邓经武 144

《山峡中》：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心路历程

——并以此纪念艾芜百年诞辰 邓伟 153

重读《随想录》 曾绍义 158

现代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档案：1949 刘福春 166

当代“潜在写作”史料：关于哑默《真与美》的史料（一） 哑默 189

关于诗与人的对话 柏桦 姜飞 217

柏桦自撰文学年谱 柏桦 229

学术信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在徐州举行 23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在聊城举行 23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版 234

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关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档案库”征求资料函 235

《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出版 袁红涛 陈黎明 235

西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档案：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 239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Contents

Preface

Our Ideal, Our Extent Reached State, Our Mode Mao Xun Li Yi (1)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The Vicissitudes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ulture Wang Furen (7)

The Contemporary Language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Culture: Among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ty Zhang Guangmang Wang Mingke (26)

Issues about Nascenc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s Modern Times

——Concurrently Talk about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Concept Yang Lianfen (40)

The Crucial Point of History and the Nascenc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Runxia (45)

The Multiple Fields of Vision on the Nascenc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Xiaochu (49)

Diversified Eyeshot of the Nascenc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Newspaper's Publication: See through the Ticking Point of the Develop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hen Fangjing (54)

Aestheticism and the Nascency of the Concept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 Huang Jie (76)

Literary Imagination Which cannot be Laid: On the Nascency and Predica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Self-government Ma Rui (82)

The Nascency and Practice of the Colloquialism Literary Theory

——Use Hu Shi's Colloquialism Theory as an Example Cao Eryun (93)

Newly Comment o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Predictive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Prospect in the 20th Century of two Anonymous Persons?

——Reading *Expounding upon Lu Xun and Kafka* Written by Zhang Tianyou in Isolation Qian Liqun (100)

- Six Pieces of *Newly Edited Anthologies Leadi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Wu Fuhui (103)
- Sad Melody of Wise Man
 ——A Study of Mu Dan's Later Poems (Korea) Jin Suxian (115)
- Argue and Contend
- "Misunderstanding" and Literary Theory's Exoticalization
 Cao Shunqing Zhou Chun (127)
- Reflect on the Explan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Modernity
 Li Zifen (130)
- What is the Objec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s Study?
 ——At the Standpoi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uan Congxue (137)
- Reread the Bashu Literature
- A Modernistic Poet was Converted to Bashu Culture
 ——He Qifang and "Huajian Poetry" Deng Jingwu (144)
- In Gorges: The Course of Mind between Light and Dark*
 ——A Paper for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Ai Wu's Birth
 Deng Wei (153)
- Reread a Record of *Random Thought* Zeng Shaoyi (158)
- Fil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File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49 Liu Fuchun (166)
-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Undergroud Literature: Materials of Yamo's
Truth and Beauty (—) Yamo (189)
- Dialogues about Bai Hua and His Poems Bai Hua Jiang Fei (217)
- Literary Chronological Life of Bai Hua Written by Himself Bai Hua (229)
- Academic Information
- The 9th Counci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eminar was Held in Xuzhou ... (234)
- Young Scholars' Sympos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eminar was Held in Liao
 Cheng (234)
- Correcting of the Ser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Studies (234)
- "Fil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licits Data (235)
- Publication of Attention in the Eyeshot of Humans
 ——Comparative Explanation of Lu Xun and Mao Dun (235)
- Brief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s Academic Disciplines: Chongqi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niversity
 (239)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方式

□ 毛 迅 李 怡

李怡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今天正式出版了。每一本新读物面世都会遇到读者这样的提问：这本出版物的宗旨何在？在当前名目繁多的文学与文化杂志当中，这样一个专业性的读物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现在，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谈谈我们编者的想法。

毛迅 这就是我们出书的意图，也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概括起来，可以称作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境界与我们的方式。

李怡 首先，这应当是国内出现的第二种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读物。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国内第一种并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刊物，它为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延伸，特别是随着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学术联系、学术交叉现象的日益强化，我们越来越感到需要有更多的阵地来参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建设，需要有更多多样化的姿态来追问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文学活动。比如，将“现代”视作一个源自晚清且并没有结束的历史过程，同时，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的范围内讨论文学，或者说将“现代文化”也一并纳入到文学研究的程序当中。还有，如何在学术发展中，逐渐探索一种学派风格的自觉，这都大有可为。

毛迅 我们将“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书名，就是希望它立足于对当下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召唤。作为搞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我们在专业工作中逐渐体会到，今天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一个纯粹“文学”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只有走出传统的单纯的专业路径，置放进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的范围之内，才能更自如地解决其自身面临的学科建构问题。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彻底模糊文学的边界，而是想立足于文化研究这样一个阔大的视野，把文学作为整体文化研究之一种文化现象来思考。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在文化研究这个大视域之中关注与文学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走出原来单纯文学的那样一个边界——仅仅就文学创作谈文学。

李怡 对，文学仍然是我们关注的中心。不过我们认为，目前许多的文学问题仅仅从文学入手并不能完全获得解决。比如，这段时间大家谈得较多的消费时代的

文学走向问题，就涉及到大的文化视界的问题。

毛迅 再如网络文学创作以及当今各种花样翻新的文学潮流，如果仅仅从传统的文学内部规律的运用——所谓本体主义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陷入一种阐释的困境。这些文学现象（作品题材、书写方式以及阅读方式）已构成对传统纯文学的某些改变，很难再用纯文学规律及标准来分析和解释了。文学呈现出的这许多发展，实际上显示出文学生存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改变。换句话说，这正是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特征。这种文学新因素的出现，正是社会文化发生改变的标志，它表明不同的文学消费群体对文学有不同的需求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读物仍然定位在现当代文学专业之内，只是在整个的文化研究这个大语境中来展开。

李怡 概而言之，追求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关系，是我们这本出版物的一个基本内容。同时，在我们的设想中，“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现代”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过去我们传统学科的分类太细，把过去 100 年以来的文学分成“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尽管学术界探讨 20 世纪文学整体性已经很多年了，一些刊物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已将 17 年文学研究纳入其学术视野，试图消弭这种学科分类的界限。但是，这个学科分类的问题在总体学术体制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如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仍各自为营。这实际上妨碍了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把握。因此，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现代”，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也包括直到今天为止的“当下”。这种设想避免了过去学科分类上的纠缠，同时会令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

毛迅 原来的学科分类具有其意识形态层面的背景。实际上这种分法大家早已经感到尴尬。我们现在是从“现代性”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现代文学的时间分期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指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所催生出的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文学开始，直到当下，没有间断。

李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谓的“现代”还会向前延伸，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在我们看来，“近代”、“现代”、“当代”在中国由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实际上是连成一个整体的，“近代”表征着中国文化“现代性”是如何萌芽的，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继续生长，到了“当代”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由此，我们出版物的宗旨可以简要概括为两点：一是追求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即关注在文化大语境之下的文学状况；二是关注“现代性”及其发展演变，也就是以“现代性”为诉求的现代文学研究。

毛迅 实际上，在教学环节中我们已经在鼓励学生从“现代性”诉求意义上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的博士生李自芬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学表达这一思考。她的论文《现代生命意识的诠释》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面孔》（皆已发表）就是将中国现代诗歌放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具体语境，从中探讨其特殊的现代性特征。而她的博士论文也是立足于“现代性”这一历史语境，试图通过清理中国现代小说中“身体”的呈现方式来探讨现代中国人在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如何想象和建构自我的。

李怡 我们的丛书希望通过将上述两个宗旨贯穿其中，为大家奠定和搭建一个

更宽敞和更自由的研究平台，从而为大家发挥才智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与此同时，在出版物的整体学术风格上，我们想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现在的文学研究杂志，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杂志，都办得各有特色，如在国内影响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其主要特点是偏重于文学史的研究，风格追求上显得成熟、稳重。但是如果我们再重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样的老路，就失去了根本的意义。我们希望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形成对其他同类出版物的一个补充，这是我们的侧重点，也是我们的特点。

毛迅 我们追求的这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由若干个小特点共同组成。首先，我们是四川大学的出版物，我们力求做到对于我们原有的蜀学的传统有所承继。巴蜀学派讲究扎实稳健的学术修养，强调对专业性知识的谨严把握，这是我们所要坚守的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因此，基于这种追求，我们有可能与其他文学研究杂志拉开距离，而这正是我们出版物风格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李怡 当然，我们并不是对于传统蜀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希望做到对传统蜀学精神的现代转化，这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现代蜀学”的精神。我们所谓的“现代蜀学”具有一种非常宽阔的语境：就是整体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体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我们倡导一种稳健、扎实的学风，在创刊号我们就推出了刘福春先生和哑默先生关于诗歌创作的丰富史料。我们希望我们的杂志成为具有典藏意义的，能够为现代文学提供大量原始材料的独特杂志。

毛迅 同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倡导一种更开阔的视野，也即国际性视野。我们希望为现代文学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方法论平台，从而改变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就像其他学科常常指责和批评的那样——太局限于专业性的工作如史料的整理和作家作品研究，而忽视了对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不断关注国际学术的发展。例如读者可以看到，我们也刊发了来自韩国的学者对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我们要强调的是，加强国际性的对话与交流，在彼此共同的频繁的交流中，更加突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意义，同时也不断为我们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学术的方法论资源。

李怡 我们想有意识地借助“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倡导在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之间形成一种频繁的对话。我们并不单纯强调某一种理论的合理性，而是展示各种观点，在理论的交流中共存。

毛迅 一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展示现代文学学科的全球性的研究情况，呈现各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我们强调一种与相邻学科在研究视界与方法上的渗透。我们希望所推出的学者，应该在学养上具备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尽管他关注的对象是现代文学，但是同样具有深厚的文艺学、比较文学、人类学等广阔的视野和素养准备。虽然要做到这点很难，但这是我们不断努力追求的方向，我们对博士研究生的引导也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

李怡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强调国际视野，强调文学与文化的沟通，强调从封闭的小文学的边界中走出来，但是并不就此否定对文学文本做细致研究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十分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

毛迅 我们希望推出的研究者本身具有对文学文本的强烈、敏锐的感受性，具有非常深厚的审美的素养、功底，能够深入地进入文学文本的细微之处。

李怡 最近几年，学界呈现出一种从纯文化、纯理论的角度研究文学的倾向。尽管也颇有所得，但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对文学文本更细致、准确的把握，属于一种脱离开具体文学事件和审美体验的空洞的论述。这种研究风气是我们所要警醒和力求避免的。按照我们的设想，我们希望将基于审美感受的文本细读与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两者更好地协调起来。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未来中国学术的一个健康的走向。

毛迅 感性的体验能力和理性的思辨能力应该是作为一种完整的整体体现在学者的身上。目前学界呈现出的这种两者分离的趋向，事实上并不是以文学的方式、审美的方式研究、审视文学，而是生搬硬套理论来对文学进行肢解，文学作品只不过成为了图解理论、试验方法的一个标本。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文学审美的扼杀。若任这种倾向蔓延，就会误导很多学生不再阅读文学作品本身。因此，这是我们这个出版物要反对的。我们坚决拒斥这种“文学研究”方式。

李怡 另外，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栏目叫“对视”。我们的初衷是开辟一个多个学科进行对话的平台，希望各个学科利用这个平台相互之间展开对话，彼此展开争鸣。我们并不是要简单地挑起争论，主要希望在学科之间的直接沟通和对话中，打破学科壁垒，彼此看到对方的优长，发现对方的问题，从而对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总体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毛迅 这种对话乃至交锋，实际上最终的结果都是使得不同的学科获得它需要获得的资源——在本学科的逻辑上难以生长出来的资源。所以，这个风格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另外，我们希望表现出这个新的出版物的学术锐气——我们强调一种学术视野上的前沿性。我们可能不要求每篇文章都是四平八稳的成熟的思考，但只要问题具有前沿性，我们也欢迎在问题形成成熟的思考之前就提出来，以引起整个学界的关注。我们倡导一种对闪光的有可能形成未来学术生长点的领域进行大胆探索的精神。

李怡 为此，本出版物提倡和推出了一种“对话体”形式，我们认为通过对话这种形式可以及时捕捉思想的火花。虽然这在传统学术的意义上也许是不严谨的，但我们认为，这不失为一种保存当下学术思想的有效方式。我们愿意把我们种种新的、敏锐的、及时的想法贡献出来供大家探讨并作深入研究，本刊将持续就若干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问题的对话推出一系列对话，或者是报告体形式文章（包括讲座、发言）。

毛迅 本期推出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学文化这个相对比较新的话题，来与学界的朋友们交流。同时我们也欢迎国内国际学术界类似的能够表现自己即兴的真知灼见的思想以及风格多样的活泼的文体向本刊投稿。甚至于像当年艾青那种感悟式的“诗论”，一两句形成一个点，在整体上有一个大的逻辑，但不需要用正统的方式去阐述，只要能成一家之言，有学术价值，我们都欢迎。

李怡 我们认为，这与本出版物另一个追求——蜀学传统的稳健和扎实——并

不矛盾。我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为当今的学术界提供多种可能和多种声音，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所促进。

毛迅 这也就是说，“兼收并蓄”也是我们出版物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大杂烩、大拼盘，我们在内在逻辑上是相互勾连的：在扎实的传统蜀学的底蕴以及开阔视野下的前沿性的追求之下，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之“当下性”的强烈关注。

李怡 除此之外，我们这一出版物创立之初，就追求一种明确的地域关怀和地域意识。在我们看来，强调地域意识和地域关怀并不是一种故步自封、井底之蛙似的狭小视野，它恰恰是当前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过去，我们中国文化往往以少数中心城市为代表，北京、上海似乎就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所有声音，这实质上既不符合一个文化发展的现实，更对我们的整个思维和文化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其文化的最终繁荣总是各个地域文化共同发展的结果。历史地看，是真正的多元化的到来——只有各个地域在自觉地追求属于本地域的独特文化风格时——才能从总体上构成文化的总体繁荣和总体的多元化。而且，只有多元化的时代和多元化的文化才是健康的文化。

毛迅 首先申明，我们对文化进行地域性的诉求并不是强调一种文化封闭主义意识。我们所强调的文化的地域特点，是被置放在多元文化也就是整个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之下来展开和审视的。

李怡 我们并不拒绝和对抗其他的不同地域风格的文化，我们追求的是与他们的对话、交流。

毛迅 我们希望达至一种和谐的交流。古人说得好，“和则生物”。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学科内的学术形态只有一两种，而大家都相同的话，它就无法延续，就不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地域风格，就是想使得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为“和则生物”这样一个良好的生态状态。

李怡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这一过于宏大的视野之下，很多地域文化中非常宝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处于一种被掩盖的状态。比如，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我们四川地区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为现代文学贡献了其他地域所不可取代的非常独特的地方风格，包括李劫人、巴金、沙汀、艾芜、郭沫若等都为我们创造出了非常独特的具有巴蜀风格和巴蜀精神的文学样式。其中有些东西，如果从中国文化总体的角度则很难对其细节、风格或是最内在的精神作出更准确的阐释。外省的其他地域作家因为特殊的机缘，比如抗战，来到巴蜀地区，这种特殊的民俗民风文化也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一些改变，如路翎的小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如果没有引入地域文化的视野，我们就很难对他们作出更准确的解释。相反，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自觉地进行倡导，不仅会推进我们对巴蜀文学、四川文学的认识，而且也推进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丰富性的认识。

毛迅 也就是说，我们所追求和坚持的巴蜀文化地域性的立场，目的地并不是巴蜀文化自身，而是想尽可能呈现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整体风貌，展示其文化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李怡 因此,我们试图以巴蜀地区为基点,通过对巴蜀文化区域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发掘,乃至对整个西部地区地域特色的自觉的把握和探索,从总体上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从而,也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西部阵营作出我们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四川大学担当此任义不容辞。因为,在整个西南乃至西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四川大学无疑应该处于一个龙头的地位,它有义务来肩负起这个历史的使命,以自己的努力来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探索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否存在一个中国现代文学西部学派的问题。

毛迅 事实上,一个学科里学术要繁荣起来,就是要有学派的出现。目前,整个国内的各种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声音——北京中心论,或者再加入上海的半个声音。在这种状态下——整个学术界只有一两种声音模式时,我们的学术境界事实上还达不到“五四”时期那样的状态。今天,在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思考已经非常深入并趋于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有一种学派建构的意识。

李怡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各个城市、各个地域的经济差别正在进一步缩小,而文化的各自的追求和特色也应该被自觉地凸显出来。因而,我们认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发展基础之上,每一个地域只有形成各自对文学和文化的独特理解,才能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希望寻找一个更加属于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追求,形成一个自己的、别人不能替代的学术个性。

毛迅 长期以来,学术群体往往自比为站在社会思想最前列的一群人,但事实上,在学派意识的追求上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今天,像园艺、茶道、餐饮等行业,都在自觉地追求自身的地域性特色并努力进行风格流派的文化建构。我们认为,作为学者群体,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思考和实际行动。

李怡 我们四川大学中文系也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希望对西部地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比如,从第一期起,我们将有计划地推出关于西部地区高校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介绍,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展示我们西部地区现当代文学的力量。

毛迅 其实,西部地区一直不缺乏现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人才。由于1980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以“北京中心”为主的一个“声音”(或者再加上上海的半个声音)主导的这种模式,造成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声音的被排斥和被遮蔽。结果便是,处于被遮蔽和排斥区域里的学者逐渐丧失了自信,丧失了有意识地去发展自身的勇气和能力。如果我们跳出这种单一声音模式,从多元文化角度看,这些处于被排斥和遮蔽状态的声音其实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并且一样优美,一样响亮,一样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这一出版物力求呈现当下中国文化的“多声部”的状态,为丰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流变

□ 王富仁

(编者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术”飙升,“思想”退位,演绎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现象。今天,作为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对自己的学术活动究竟应当持怎样的认识,而我们常常引以为荣的现代学术史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仔细辨析的重大问题,其意义不仅关乎我们学术传统的总结,更关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定位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王富仁先生最近完成了长达十二万字的论述《“新国学”论纲》,深入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思考。全文将由《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于 2005 年连续刊出,为了让本出版物读者及时了解其中的精辟思想,并参与由此引发的学术史反思,我们特别选择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以“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流变”为题在本刊推出。

一

“国学”是在 20 世纪初年,为了将中国学术同西方学术区别开来而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晚清知识分子开始使用的“中学”和“西学”,但那时的“中学”主要指由宋明理学家系统化和条理化了的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西学”则主要指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更加重视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晚清知识分子将“中学”概括为“道”,而将“西学”概括为“器”。被后人称为“复古派”的官僚知识分子坚持的是重“道”轻“器”的文化观念,并以这样的观念拒绝和排斥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被后人称为“洋务派”的官僚知识分子则在强调“器”的作用的前提下,主张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以说,正是“中学”、“西学”这两个概念的划分,将中国的学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看到,直至现在,代替“中学”这个概念的“中国文化”和代替“西学”这个概念的“西方文化”,仍然是我们中国学术的两个关键词,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构架。我们学术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分歧,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归结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及其关系的问题上来,并且一旦回到这个基本问题上,彼此的对话就中止了,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了。我认为,我们现当代学术研究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从那时就已经形成的这个基础的学术构架有关。学术研究的大忌就在于基础概念的模糊,而这两个基础概念本身就是极为模糊的。它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

定义方式，这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又是建立在各不相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学”和“西学”之争，在我们流行的历史描述中，是以洋务派的胜利和复古派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我认为，洋务派对复古派的胜利，实际只是现实政治实践层面上的胜利，而不是思想和理论上的胜利。在理论上，洋务派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复古派重“道”轻“器”的思想，因为洋务派自己也是重“道”轻“器”的。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文化思想的最完整的表述。在这里，“体”是自主的，“用”则是从属的；“体”不是为“用”而存在，而“用”则是为“体”而存在的。它重视的还是“道”，只不过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不但不会削弱“道”，削弱中国的伦理道德秩序，还会巩固和加强“道”，巩固和加强中国的伦理道德秩序。后来的事实证明，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引进，不但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反而一次次冲击和破坏着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秩序，一次次轰击和动摇着我们对“道”的传统理解。其中固然有我们过去着重宣扬的正面的效应，但同时也有我们至今常常讳言的负面的效应。导致洋务派这种文化“短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理论上，是由于它的“体”和“用”的二元论：它的“体”不是它的“用”之“体”，它的“用”也不是它的“体”之“用”。在这里，洋务派实际是用张冠李戴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理论表面上的统一性。假若我们仅仅从学术的意义上理解晚清洋务派与复古派的思想论争，它涉及的实际是中外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固有的理论体系中，它指的是“德”与“智”的关系的问题；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指的是“善”与“真”的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当前的学术体系中，它指的是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的关系的问题。智力的发展一定会促进人类道德的完善吗？真理的认识一定会净化人的心灵吗？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能够提高人文素质吗？对于这些问题，洋务派知识分子没有做出回答，也不想做出回答。这使他们在理论上反而失去了复古派所坚持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在实践上具体表现为单纯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唯智主义的倾向。在洋务派官僚掌权期间，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迅速地发展着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瓦解。所以，洋务派对于复古派的胜利不是理论上的胜利，而只是现实政治实践层面上的胜利。它的实质意义在于，在中华民族遇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权侵略的时候，发展现代科技、发展现代工业、发展现代军事，已经成为国家政治事业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即使从维护自己政治统治权力的角度，中国的政治统治集团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统治策略，也不得不重视对西方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吸纳和运用。这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不尽相同的中国近现代的国家观念。传统伦理道德仍然是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思想基础，但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现代国家。这导致了近现代国家政治实践上的分裂趋势，洋务派思想在理论上的这种不完整性、不统一性，恰恰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国家政治实践上的矛盾和分裂。

在过去，我们常常用“复古”、“守旧”、“保守”批判晚清复古派知识分子，但

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是毫无力量的，因为“复古”、“守旧”、“保守”都不是绝对的反义词，都不等同于错误。一个社会需要发展变化，也需要稳定团结；需要滑动力，也需要摩擦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复古”、“保守”、“守旧”起的就是社会摩擦力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的作用。在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体系中，“道”体现的是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状态以及为实现这种状态对各种不同的人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器”只是为了实现并维护这种社会状态所使用的方式或工具，它的作用是融化在“道”之中的，“道”在“器”在，“道”失“器”失，“器”在“道”中，“器”不离“道”，“器”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复古派在政治实践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在理论上的失败，“道”、“器”合一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放弃的思想理想，这使晚清复古派的思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还将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并经常以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我认为，晚清复古派知识分子的失败不在于他们的“复古”、“保守”和“守旧”，不在于他们反对改革、消极地维持现实社会的统治秩序，而在于他们不可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在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则是因为他们也同当时洋务派知识分子一样，仅仅停留在当下现实政治实践的层面，而没有将其上升到学术的、理性思想的高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中国战略思想中的一句名言。复古派知识分子要想有效地抵制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他们是在根本缺乏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条件下批判西方的科学技术的。这就使他们的反对毫无力量，并且随着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实践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们的思想也就无法深化发展为一种哲学，一种学术。在他们的思想运作中，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学术的意义就在于认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论对西方以及西方文化持什么样的具体态度，都必须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都必须是感受、了解、思考、研究的结果。放弃了认知，就放弃了学术。而传统夷夏之辨的观念却极其简单地取消了对西方及其文化的认知，这使复古派知识分子在与洋务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论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当他们丧失了现实政治权力的支持，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思想力量了。

晚清洋务派和复古派在其思想主张上是对立的，但在其思想特点上则是相同的：他们的思想都仅仅停留在当下政治实践需要的层面上，而不具有真正理论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他们几乎都是官僚知识分子，而在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中，臣子是为维护皇帝的政权而服务的，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主要停留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而奏折在那时的文体形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在政治体制内的学术论争，常常只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论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思想的征服力，而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大小，这局限了他们思想的正常发展和充分表达。中国近现代学术在他们那里开始萌芽，但还没有成长起来。仅就学术而言，世界地理学的发展是洋务派文化中最具有现代性质的学术成就。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等等，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愿望及其现实视野的扩大，从而也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继续发展奠